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莘
张磊
编

孙中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莘
张磊
编

孙中山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孙中山卷/张苹, 张磊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300-21329-3

I. ①中… II. ①张…②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孙中山 (1866~1925)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2382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孙中山卷

张苹 张磊 编

Sun Zhongsha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34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45 000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

他诞生于暴风骤雨席卷九州大地的峥嵘岁月，梁启超曾经为之发出这样的感叹：“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正是“天崩地解”般的近代中国曲折剧变的历史进程，把他铸造成一代巨人。

任何杰出人物作用于历史并非随心所欲，他们的眼界、观念和理想总是为时代所制约，而其活动只能立足和凭借于现实的舞台，是以堪称“时势造英雄”。但是，历史又是人们创造的，出类拔萃者必能倡导一定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他们的作为所产生的重大能动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英雄造时势”也是这个命题的又一侧面。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伟大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必须充分肯定。他以近4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广阔的时空舞台上演出了多幕悲壮史剧。他的政治生涯延伸了两个世纪，贯串了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他的足迹遍布许多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 and 地区，他接触了各种类型的人士。他力图使祖国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他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给时代留下了自己的鲜明印记。

孙中山不愧为一个巨人，他的思想和实践是多方面的，内涵极为丰富。他几次环游世界，能操数种语言；他求索于古今中外的思想宝藏以熔铸救国拯民的真理，并在难得的间歇中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他毕生从事革命的“战争事业”，甚至身兼统帅与“排长”^①；他始终与时俱进，从不在奔腾的“世界潮流”前故步自封；他感受过胜利的欢欣，目

^①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1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睹共和制诞生于封建君主制的废墟；他经历了更多的顿挫，迭遭通缉和绑架；他曾有过“槁木死灰”的心境，却能“愈挫愈奋”……当然，他的形象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他不是光环笼罩的神祇，只是一位“大写的人”。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孙中山扮演了民族英雄、革命领袖的重要角色。他必须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刻担负起开拓的重任，因为严峻的现实是：无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抑或思潮澎湃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都不能拯救中国，难免以悲剧告终。他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勇敢地超越了前行者——制定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从而使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由准备阶段进入正规阶段。他又是建设事业的重要擘画者，为实现近代化殚精竭虑，提出了规模恢宏的纲领和方案，因为他确认革命与建设相辅相成。当革命新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后，他积极地迎接急湍的时代大潮，让自己的思想和实践经由检验和扬弃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始终超越不已、攀登不止，无论是声望、威信和年龄的增长都未能导致其思想僵化和独断。他从爱国和热衷于社会变革的青年，成长为民族英雄和民主革命领袖，又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不愧为时代潮流的引导者。

孙中山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形象地呈现为一个“弧形”加以半个“弧形”。第一个“弧形”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动的写照，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构成升弧，辛亥革命为其顶点，“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则显示为降弧。第二个“半弧形”反映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业绩，其顶点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弭平广州商团叛乱和北上。他的非时的逝世中断了“弧形”的高扬。

为了拯救和发展祖国，孙中山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为新世界诞生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中，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在“悲剧的高度”——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虽然事业未能及身而成，壮志未酬。他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儿子。同时，他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向，“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他的终极奋斗目标，因之

获得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程度国家的认同。所以，他也理所当然地属于世界。

(一)

孙中山的故乡在濒临南海的广东香山县。

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岭南以“富而通”著称。但孙中山于1866年冬诞生于兹的翠亨村却不富饶：“负山濒海，地多砂磧，土质硗劣，不宜于耕”^①。仅有70余户的村庄的大部分居民生计艰难，孙中山出生时的家境也是非常困苦的。父亲曾在澳门当过鞋匠，后来返乡租田耕作并兼更夫。孙中山从6岁起就参加农家的辅助性劳动，年龄稍长便下田操作。番薯成为经常的主食，很少有鞋穿。困苦的生活在孙中山童稚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曾自称“我是苦力，同时也是苦力的儿子。我生于穷人家，我自己仍然是穷人”^②。在他看来，“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③。幼年 and 少年的遭际使他“早知稼穡之艰难”，他自称后来倡导民生主义显然与“境遇之刺激”有关。^④

香山，蕴含着可歌可泣的爱国与革命的传统。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曾经驻节县城，壮烈捐躯的水师提督关天培在磨刀洋面迎击过英国侵略军，民众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更是广泛流传。刚刚覆败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更给少年孙中山以深刻的印象。他从返乡的太平天国战士的口中了解到天国英烈的壮举，热望“洪秀全灭了清朝”，并为这出史剧的悲惨结局而惋叹。深植于人民中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战斗精神哺育了孙中山，使他衷心地赞扬故乡“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性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⑤。

困苦的生活并未压倒这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孙中山陶醉于自己的意趣：游泳、捉鱼、捕鸟、放风筝、踢毽子；到附近武馆看三合会员练武；和小伙伴们在山野间模拟太平军同清军作战。直到10岁方才入塾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L. Sharman, *Sun Yat-sen: His Life and Its Meaning*. New York, 1934-09-04.

③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④ 参见〔日〕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载《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⑤ 《孙中山全集》，第4卷，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读书。他认真学习，为了节省灯油而在月光下阅读，但对不求甚解地背诵儒家发蒙读物和典籍颇为不满，曾向塾师要求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释义。随着观察和思考能力的逐渐提高，周围的封建陋习引起他的反感。他厌恶赌博、蓄婢、纳妾，反对家人给姐姐缠足，并因诘责专横的胥吏险被刺伤。愚昧、苦难和窒闷的社会氛围，使这个喜欢思索的少年常常感到困惑和痛苦。

孙中山愈益强烈地憧憬和企慕着新世界，甚至甘愿离乡背井——虽然水碧沙明的兰溪和草木苍翠的金槟榔山长系心头，并在辗转流亡异域时化为浓郁的乡愁。他虽终未一睹镇上牧师保有的世界地图，但外部的信息不断传到素以侨乡见称的香山。他的长兄孙眉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远航到檀香山（夏威夷首府，又名火奴鲁鲁）去做劳工，并逐渐拥有了商店和牧场。他对太平洋中那个“草经冬而不枯，花非春而亦放”的群岛心向往之，终于在13岁时跟随母亲登上了停泊在澳门的格兰诺琦号轮船，经历20余个昼夜的航程，抵达了碧波环抱的夏威夷。澳门是他走向世界的起点，远行扩展了他的视野和增加了他的新的感受——“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①而在夏威夷居住的5年中，他在美、英教会开办的学校里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开始学习英文。夏威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显然给他以很大的激励：“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②。

孙中山于1883年夏辍学回国。开阔的眼界，新的知识和感悟，变革的热忱，“神圣的权力不是永恒的”观念……使青年孙中山对故土感到陌生、忧虑和愤懑。他从香港换乘的沙船初入国门便受到清吏的勒索，令他疾呼：“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能坐视不救吗？”遵从亲人们的意愿，他在翠亨参加耕作和继续自修。同村的青年陆皓东、杨鹤龄等与他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议论时政，抨击官府的弊端，提出改良乡政的各种措施。然而，乡居生活并未长久。他们反对封建迷信的活动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在檀岛时就不以崇奉关帝为然，于今乡民膜拜北帝庙中的木雕泥塑益发使他反感。“劝勿妄信”没有效果，他便与陆皓东进入庙中折断北帝直竖的中指，又将金花娘娘的脸蛋用指甲挠成花脸，还对北帝大加申斥。笃信神灵的乡民非常惊恐和愤怒，把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47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2卷，3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亵渎神像者视为“疯孩子”。他的父亲只得应允修复神像，而他则被迫前往香港。在进入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拔萃书室后，他与陆皓东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教义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曾留下了痕迹，科学则又使他逐渐淡化宗教观念——“余于耶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颇感耶稣教之不合论理，因不安于心”，结果“大倾向于进化论”^①。他后来绝少参加宗教活动，甚至他的战友们几乎“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

就在孙中山赴港求学的那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了。自英国于1840年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推行殖民掠夺政策，并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了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枷锁，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人民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此起彼伏，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则是汹涌浪潮的高峰。随着19世纪7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的萌发，加以强有力的外铄作用，剧变的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进入历史舞台。法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深化了民族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激励了爱国主义的昂扬，推动了维新思潮的发展。爱国与变革的强劲的时代二重奏给予青年孙中山以“希望和勇气”，香港工人拒绝修理工舰和装卸法货的正义行动使他受到启示和激励。他认为这一切“证明中国人已有相当觉悟”，因此，“战胜法国并非难事，只靠民众力量”。当然还“应当造钢铁的船，木头船是没用的”^②。他愈益密切地关注政局，否定现存政权的观念潜滋暗长，曾向檀岛的朋友表示：学有所成后“就要准备推翻满清”。后来，他强调了这场结局屈辱的战争给他的重大影响：“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③

1884年到1886年间，孙中山就读于港英当局主办的中央书院。由于阅读中文书刊存在困难，便于课外努力补习国文。当他修毕书院的中学课程后，他面临着生活的抉择。军事和法律曾是他的学习取向，但他终于选择了学医，“以医亦救人之术也”，况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十分落后，中法战争期间暴露出的救护工作的严重缺陷，引起了他的关注。

1885年夏，他与同邑外壠村人卢慕贞成婚。

① [日] 宫崎滔天：《孙逸仙传》，载《建国月刊》，第5卷第4期。

② [美] 林百克：《孙逸仙传记》，中文版，157～161页，上海，上海三民公司，1928。

③ 《孙中山全集》，第7卷，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孙中山的习医生涯，始自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在学堂期间不过年余，留给周围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对教学中“不合理制度”的改革主张。他要求男生参加产科实习，并使校方采纳了这个合理建议。他还结识了同学郑士良和算学馆的学员尤列，经常议论“维新兴国”的有关问题。郑士良与会党关系密切，他正是通过这位同窗的中介接触了秘密会社。1887年初，孙中山转入香港伦敦传道会和议政局议员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因为那里“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①。在五个学年中，他研读了物理、化学、植物、解剖和药物等学科，取得优异成绩，但并不满足于专业知识。达尔文——其时刚逝世不久——的进化论令他心折，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史使他激奋。他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各种派别的政治学，并把“通晓舆图”作为实学要旨。他学习国学的热情依然饱满，认真探讨“历朝制度之沿革”和“古今治乱之道”。孙中山在大学阶段基本完成了“欧洲式的教育”，这种机遇在同代人中是罕见的。

孙中山更为热切地关注国事，经常同郑士良、尤列及稍后结识的同学陈少白到校舍附近杨鹤龄家的商店“杨耀记”聚会。他们上下陡峭的石级，穿过狭窄阴暗的街道，“听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②。许多“无所忌憚”的言论惊世骇俗，使他与陈少白、杨鹤龄和尤列获得了“四大寇”的谑称。另一方面，与激进的观念并存的则是温和的维新思想。孙中山在1890年前后曾致函退休乡居的原任职海关道并出使过欧美的同邑郑藻如，提出兴农桑、禁鸦片和普及教育等主张。他还与一些维新人士有着密切联系：同郑观应商讨“改革时政”，后者曾在风靡一时的著作《盛世危言》中称道他为“吾邑孙翠溪西医”。他的老师何启给他以较大影响，这位留英研习医学和法律的维新人士的代表作即是流传广泛的《新政真诠》。当时，热情的青年受到维新思潮的浸润是可以理解的。仿效西方、变法改革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君临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种冲击，含有民主主义的崭新内容和启蒙意义。

1892年，孙中山以优异成绩毕业。教务长康德黎向他颁发的医学士证书执照内称：“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俱皆通晓，确堪行世。”然而，这名合格的医生却不

①② 《孙中山全集》，第6卷，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满足于自己的职业。他更热衷于医国的崇高事业，因为他已确认“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亦然”；而“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①。他的这种“真知”把握了改造社会的关键，成为他投身政治斗争的思想依据。在他赴澳门开业时，曾在船上对陈少白“讲到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么造反”^②。

作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孙中山在著名的镜湖医院悬壶。开诊是义务性质的，补偿是由院方设法借贷给他开设中西药局。他的医德和医术颇受赞扬，“就诊者户限为穿”。但他并未在澳门久留，主要是当地缺乏社会活动的良好条件，加以葡国医生的排挤，致令医务“猝遭顿挫”。孙中山于翌年前往广州，在省城设立东西药局。很短的期间，就出现“病家趋之若鹜”的现象。只是他越来越热衷于政治活动，“行医日只一两时，而从事革命者实七八时”，月入近千元的收入也被大量挪用。他和许多志士经常聚会于圣教书楼后面的礼堂和广雅书局内南园抗风轩，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并积极“接纳会党，联络防营”，还同水师中的青年军官们建立了联系。组建革命团体的课题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提及兴中会这个名称，宗旨则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只是由于人数过少等原因而未形成“具体的组织”^③。

1894年初，孙中山与陆皓东回到翠亨村起草《上李鸿章书》，他认为自己的主张如被采纳，当可实现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比较顺畅，易于奏效。是年春天，他与陆皓东携书北上，从此告别了医务，开始踏上职业革命家的艰苦而又光辉的道路。他们在上海稍事逗留，会见了郑观应和另一位维新人士王韬，请他们为介于李鸿章的幕僚，并再次修改了书函。6月，他们抵达天津后递上信札。《上李鸿章书》指责了“滥征”、“多弊”的封建苛政，批判了“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的洋务派的“舍本而图末”，阐明了“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坚信“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④。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359页。

②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载《建国月刊》，第1卷第3期。

③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页，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8、15页。

然而，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虽以洋务闻名当世，且为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却对来自岭南的投书者未加理会。北上奔走呼吁的结果，不过领得一纸“农学会筹款护照”。

《上李鸿章书》的内容全然属于维新思潮范畴，郑观应因而赞为“其说亦颇切近”。但是，孙中山不同于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式的“君子”们。他的思想还有着另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贫苦农民和华侨企业家家庭中度过，感受过民众的疾苦，所受教育和经历则使他较为了解西方，沐浴了民主主义精神，传统的中世纪意识积淀相对单薄。在他看来，古老的帝国和最高的至尊并不具有“永恒的”性质，否定现存社会制度的“造反”，决非大逆不道。作为较少承受因袭重担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当他意识到维新思潮的局限，就能够跨出关键性的步伐，开拓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征程。

他此后的活动，标志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正规阶段的到来。

(二)

毫无疑问，上书的挫折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刺激。但此行并非徒劳的，他得以进一步认识了清廷的腐败：“满清政治下之齷齪，更百倍于广州”^①，加之中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这些因素激发了他的革命意识：“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②

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历程达到了第一个临界点。

然而，孙中山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西方，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早已过去，1848年的民主革命也带着不彻底性告一段落；在东方，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较为成功；而1871年异军突起的巴黎公社，只是预示了新的革命时期的到来。至于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清朝政府，甚至不允许温和的变革，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就是铁证。但是，来自西方的革命影响不可抗拒地传到了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殖民地附属国在20世纪的曙光中觉醒，“世界风暴的新源泉”在两种革命运动交替阶段于亚洲涌现。由于“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7卷，116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52页。